

丰镐遗址新出陶文及其相关问题再论

王一凡 付仲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关键词〕大原村制陶遗址 陶文 都邑

〔内容提要〕2017—2018年,丰镐遗址沣西大原村制陶遗址陶窑新出一片陶片上有三个陶文。其中两个为“”“”,另一残缺。该字可释为“田”,亦可释为“周”。从先周晚期至西周晚期“周”字的写法与2015年河南伊川徐阳墓地东区M4新出“成周戈”,以及新见陶文出土位置的特殊性,应将其释读为“周”。由此再结合周原遗址凤雏基址、齐家北和礼村的“周”字陶片,先周晚期至整个西周时期,周王所居具有王都性质的城址丰镐、周原应均可称“周”。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483(2025)04-0064-09

DOI:10.16422/j.cnki.1001-0483.2025.04.006

Key words: Dayuan Village Pottery-Making Site Pottery Inscription Capital C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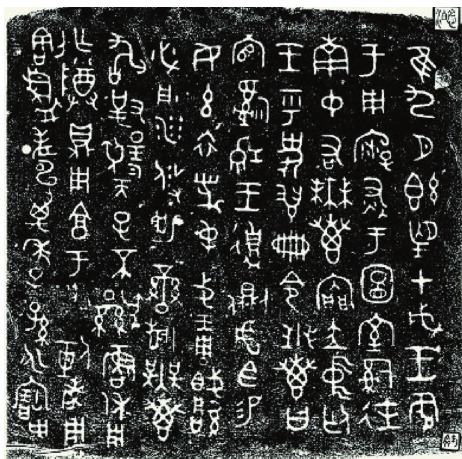
Abstract: During the 2017-2018 excavations at Dayuan Village Pottery-making site in the western Feng River area of the Feng-Hao Site, three pottery inscriptions were discovered on a newly unearthed ceramic fragment from a kiln. Two of these inscriptions are identifiable as "" and "", while the third is partially damaged. The character could potentially be interpreted as either “田” (tián, "field") or “周” (Zhōu, "Zhou").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haracter “周” from the late pre-Zhou to the late Western Zhou period,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the inscription on the “chengzhou dagger-axe” (newly unearthed from Tomb M4 in the eastern sector of Xuyang Cemetery, Yichuan, Henan in 2015), and the unique context of the pottery inscription's discovery, the character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周” (Zhōu). Furthermore, when considered alongside pottery fragments bearing the character “周” unearthed at the Fengchu building foundation in the Zhouyuan Site, as well as those from Qijiabei and Licun, this finding supports the conclusion that both Feng-Hao and Zhouyuan - urban center serving as royal capitals from the late pre-Zhou period and the entire Western Zhou ear - could be referred to as “Zhou”.

2017年,西安沣西大原村制陶遗址出土刻符陶片1件(图一),简报介绍:“刻符陶片1件(17T1932H7:25)夹砂褐陶。推测为鬲颈部残片。表面刻两个‘田’字符号,另有一个类似的符号残缺大部。残长约8.1、厚约1厘米。”^①

陶片表面上的这个“”字符号,若直接释读,可释为“田”。郭沫若指出:“卜辞中常见的田字就是一个方块田的图画,殷代必然有四方四正的方块田,才能产生得出那样四方四正,规整划分的象形文的田字。”^②不过,在商代甲骨文与目前已发现的先周晚期至西周早期陶文中,“田”字也可以释读为“周”。陈全方指出陶文“田”即周字,指岐周^③。雷兴山通过对大量陶文的比较辨别后指出:“(周原遗址陶文‘周’字的写法),基本是先刻划三个竖道,然后再刻划三个横道,横道笔画叠压在竖道之上,最外两竖道和上下两横道交接处出头,有时三竖道与



图一 陶片17T1932H7:25上的刻符



图五 无夷鼎铭文



图六 焦山鼎及铭文

“周庙”的“周”字写作“”（图五）。虽然《集成》中给出的拓片“田”字右上有残缺，但查清光绪十九年（1893）贵池刘氏木刻补日本《金石图说》卷一中牛连震《焦山鼎》^⑬一文文首图（图六），此处的“周”字写作“”，为上下封口的三横三竖。而“周庙”也应在都城之内。由此可见，“周”字在先周晚期至西周晚期的陶文或金文中，均有写作下方无“口”的三横三竖的“田”状者。这种写法是贯穿西周一朝的。虽然有“周”的写法存在演变，但即便是西周晚期，“周”字也可保留有较早期的写法。

第三，丰镐陶文的出土位置具有特殊性。丰镐遗址是西周王朝的都城之一，在传世文献与金文中被称为“宗周”。而大原村制陶遗址正处于沔河之西的丰京遗址范围内，规模大，产量高，“是丰镐遗址内目前发现的最大一处西周制陶手工业作坊遗址”^⑭，性质与地位十分特殊。其产品的口沿上刻有“”字陶文，可能与产地存在较大关系。

基于以上三方面因素，我们更倾向于将丰镐遗址新出的陶文“”释读为“周”字。

二、备受关注的陶文“周”

陶文“周”字关系着西周都邑性质的确定。从周原陶文的研究中可知，“田”可释读为“周”字^⑮。把陶文、金文、传世文献中均出现过的“周”定在何处，那关于“岐周”“宗周”“成周”等地点的称名与认知则会发生相应地调整。沔西大原村新出的陶文将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具有较高价值的新材料。

前辈学者对传世文献中的“周”，卜辞中的“周”，西周金文中的“周”，西周陶文中的“周”有充分讨论。先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统计如下，综合分析（表一）。

表一 “周”字讨论诸说

郭沫若	西周金文中“周”指成周 ^⑯	成周说
陈全方	传世文献中的周、甲骨文中的周指周原岐周 ^⑰ ，陶文“田”即周字，指岐周 ^⑱	岐周说
宗德生	“周”是指岐周，即周原遗址 ^⑲	
尹盛平	成王五年以后金文中的“周”就是岐周 ^⑳	
冯时	金文中的周地在周原遗址，分东、西 ^㉑	
孙庆伟	西周的都邑“周”地是周原遗址 ^㉒	
刘海宇	西周金文中的“周”指岐周 ^㉓	

续表一

何树环	西周铜器铭文中当地名用的“周”只能是指宗周镐京 ^{②4}	宗周说
何景成	《尚书》诸篇中用作地名的“周”都是指宗周镐京 ^{②5} ，西周金文中作为地名的“周”很可能多是指宗周 ^{②6}	
曹玮	西周金文中作为具体地名的“周”，是西周王朝的宗庙所在地，具体指文王在殷商之丰地建立的都城，是西周三京之一，与武王之宗周、成王之成周共同构成西周时期的政治中心 ^{②7}	丰京说，宗庙所在地
陈梦家	西周时期，作为地名的“周”，在成王营成周前及武王时代，“周”可指岐周，可指宗周；成王以后的“周”既不是宗周，也不是成周；成王时（及以后）“周”是王城，与之并立的成周居殷民 ^{②8}	时代不同 指代不同或可多指
朱凤瀚	文献与金文中能称“周”之城邑，应是王所居之都城，西周都城所在如宗周、成周应均可称之为“周” ^{②9}	
雷兴山	陶文“周”字的含义有两个，一是指具体地名，二是指族名或国名……周原遗址在先周晚期第6b段时名“周”，沔西遗址在迁丰后至成周建成前这一时期，亦名为“周”（成周建成后，丰便不称“周”），西周时期的周原遗址也可能就是西周金文中的‘周’地 ^{③0}	
赵庆森	西周金文中的“周”地是指西土岐周，即周原遗址。传世文献所见周初之“周”或指镐京 ^{③1}	观点前后发生改变
唐兰	由“康宫原则”得出周指成周 ^{③2} ；史墙盘出土后认为周指岐周 ^{③3} ；讨论高卣时，提出唯还在周的“周”应即王城 ^{③4}	
李学勤	在讨论史墙盘时认为，“周”指今天的周原遗址 ^{③5} ；在讨论王孟与柞伯簋时认为，“周”指宗周，即镐京 ^{③6}	其他
董珊	“周”作为国族名，殷墟卜辞中的“周”不是姬姓周人，西周金文中的“周”族也不是姬姓，而是姁姓 ^{③7}	

以上岐周说、宗周说、成周说等均有一定道理，但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论证中使用的出土遗物或传世文献上的文字所指代“周”地的时代并不统一，判断标准也缺乏一致性；第二，部分遗物上的“周”字没有明确的考古遗迹单位，并不能与某些特定遗址紧密联系；第三，目前任何一种说法都没有确切的证据可否定另一说法，或部分赞同其他说法中的某些部分；第四，有的学者前后观点因新出材料存在一些变更，这更让我们意识到新出材料的重要性。

在诸说中，雷兴山的观点需给予足够重视，他从周原遗址出土数个陶片上所见的陶文“周”出发，综合石器刻文、卜甲、铜器铭文，明确了陶文“周”与周地的关系，对“周”地与先周文化也进行了研究，指出：“陶文‘周’字的含义有两个，一是指具体地名，二是指族名或国名……周原遗址在先周晚期第6b段时名‘周’，沔西遗址在迁丰后至成周建成前这一时期，亦名为‘周’（雷先生对尹盛平、曹玮提出的大约在洛邑建成后，为以示区别，将新邑改名为‘成周’，将镐京改称为‘宗周’，而‘岐下’之周则仍然名‘周’的观点表示赞同），西周时期的周原遗址也可能就是西周金文中的‘周’地。”^{③8}这是利用有明确出土单位的陶文“周”讨论周地的典范，具有很高的考古学价值。以上见解，笔者非常赞同。现在，随着丰镐遗址沔西大原村制陶遗址陶窑中新出刻符陶片的发现，西周晚期陶文“周”之含义与所指，或许还可进行一些补充。

三、新出陶文“周”与何地可称“周”

（一）丰镐遗址 2017 年新出陶文及其重要性

结合本文第二部分对陶文“”字的辨析，丰镐沔西大原村制陶遗址出土陶片 17T1932H7: 25

上的2个可辨刻符均是“周”(另1个刻符残,不可辨认)。通过观察,此3个刻符均是在烧制前刻出的。因陶片为夹砂褐陶,且部位应是某件疙瘩鬲的颈部外侧,所以,应与发掘中大量出土的夹砂褐陶疙瘩鬲同是烧制的产品,时代也应是发掘者所定的西周晚期偏早阶段。

从断面茬口处观察,截面可分为3层,外层和内层为红褐色,中层为灰色。中层灰色略显此器有少许烧流,加之H7周边分布有数座同时期的陶窑址(含操作间),其中填埋的陶片大多可复原为同类型的夹砂褐陶疙瘩鬲,故该刻符陶片应是本地“大原村西南制陶手工业作坊区”的产品。

刻符陶片产地的确定,可为研究陶片烧制地点的属性提供较高信度、较大信息量的证据。陶器的流动性低,使其具有相较于青铜器更明确、更稳定的位置信息。陶文中的地名相较于铜器铭文中的地名,更可能指向陶文出土的地点。通过陶片17T1932H7:25上“周”字陶文,可推测丰镐遗址西周晚期的称名情况。

同时,发掘简报指出:“根据钻探和发掘情况看,大原村制陶遗址分布在东西约400、南北约200米范围内。发现的陶窑也均是西周晚期专门烧制夹砂褐陶分裆疙瘩鬲的,那该遗址就是丰镐遗址内目前发现的最大一处西周制陶手工业作坊遗址。”^⑨且大原村制陶作坊规模大,产品还有单一化、专业化生产现象^⑩,体现了大原村制陶作坊在丰镐遗址中的重要地位,又彰显了这片刻有“周”字陶文陶片的重要意义。

综上,刻有“周”字陶文的陶片17T1932H7:25是齐备“出土遗址、出土单位、烧制时代、明确产地”这“四要素”的重要遗物。其产地应是本地的“大原村西南制陶手工业作坊区”。

(二) 由17T1932H7:25看西周晚期的丰镐遗址可称“周”

既然“大原村西南制陶手工业作坊区”出土的烧制品上刻有陶文“周”,其时代是西周晚期,且这种产品(夹砂褐陶分裆疙瘩鬲)在周原遗址和洛邑遗址少见,而在丰镐遗址西周中晚期常见^⑪,那么,这一区域在西周晚期被称为“周”的可能性是极高的。相较出土于灰坑、房址中产地不明的刻有陶文“周”的陶片而言,陶片17T1932H7:25具有明确的单位信息与产地信息。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丰镐遗址在17T1932H7:25所处的西周晚期偏早阶段可被称为“周”。

(三) 由马王村H11陶鬲看先周晚期的丰京可称“周”

以往在丰镐遗址中也出土过刻有“周”字陶文的陶器,学者们亦有关关注^⑫。沔西马王村H11的陶鬲在腿腹间各刻1个“田”字符号(图七)^⑬(其出土单位H11被H10打破,故在部分记录时会标记为马王村H10)。雷兴山已辨认其为“周”,并依此指出沔西遗址在迁丰后至成周建成前这一时期,亦名为“周”,且同意尹盛平的认识,即大约在成王五年洛邑建成后,为示区别,将新邑改名



图七 沔西马王村H11的陶鬲及刻符
1. 线图 2. 照片 3. 陶文

为“成周”，将镐京改称为“宗周”，而“岐下”之周则仍然名“周”^{④④}。由此来看，西周王朝在雒邑建成后，同时拥有周原、丰镐、雒邑这3座大规模都邑性城址。为了区别，才将周、宗周、成周的名称安置给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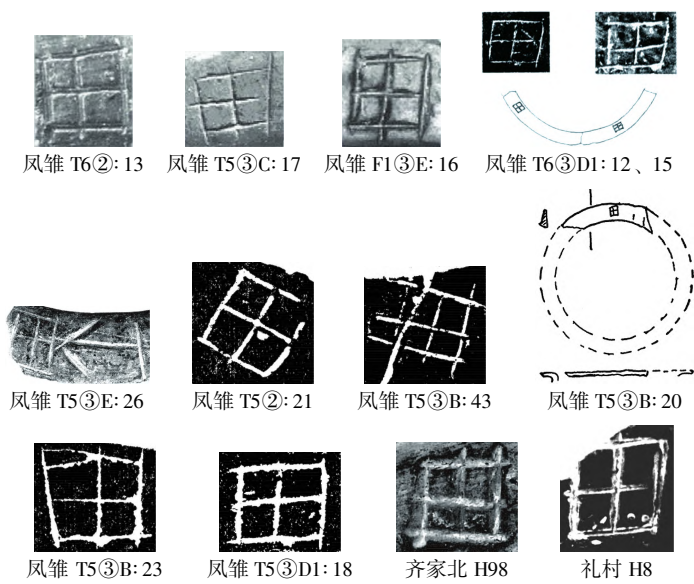
此次沔西 17T1932H7:25 上陶文“周”的出现，可以说明，即便在成王建成雒邑之后，丰镐地区可能依然称“周”，直至西周晚期。

(四) 由陶文“周”看不同时期丰镐、周原遗址的情况

在发掘报告与研究论文中，被学者认为出土了陶文“周”的商周遗址，除丰镐、周原外，还有长武碾子坡、扶风岸底、西安老牛坡。雷兴山根据陶文“周”的判断标准，认为长武碾子坡、扶风岸底、西安老牛坡的并非“周”字^{④⑤}，笔者赞同这一观点。那么，多次出土有陶文“周”的丰镐、周原遗址在西周时期的情况与地位又是如何呢？接下来将着重讨论。

先将商周时期出土的陶文“周”及与之相关的陶文列表于此（表二）^{④⑥}。

表二 商周时期出土的陶文“周”及与之相关的陶文

出土遗址	陶文图片	时代	备注
碾子坡 ^{④⑦}	 碾子坡 H808:3	相当于殷墟二期	并非“周”字
岸底 ^{④⑧}	 岸底 H7		
老牛坡 ^{④⑨}	 老牛坡 86XL III 1M43:1	相当于殷墟四期	并非“周”字
周原	 风雏 T6②:13 风雏 T5③C:17 风雏 F1③E:16 风雏 T6③D1:12、15 风雏 T5③E:26 风雏 T5②:21 风雏 T5③B:43 风雏 T5③B:20 风雏 T5③B:23 风雏 T5③D1:18 齐家北 H98 礼村 H8	风雏基址出土陶文陶片年代为先周晚期或商周之际，齐家北 H98 与礼村 H8 出土陶文陶片年代为周原遗址商代陶器分期的第六段（第 6b 段）	多数年代为先周晚期

续表二

出土遗址	陶文图片	时代	备注
丰镐	 沣西马王村 H11 陶鬲	先周晚期	“周”字，出土于灰坑中
	 沣西 17T1932H7:25	西周晚期偏早	“周”字，出土于灰坑中，可明确为本地本作坊产品

从出现形式看，陶器上出现的陶文“周”大多单字出现，即便有与之同刻的字（符），也不能组成完整的语句，这样的陶文“周”更类似于后世的地名陶文戳记^⑤。再者，从现有材料看，真正出土陶文“周”的商周时期遗址，只有周原与丰镐两处。这两处遗址是西周关中王畿的两个核心都邑，等级高、规模大、政治地位处于西周王朝的塔尖。不过，若从时代分析两处遗址出土的陶文“周”，则是存在区别的。雷兴山指出，周原遗址凤雏基址、齐家北和礼村 3 个发掘地点的“周”字陶文，多数年代为先周晚期（周原遗址商时期陶器分期的第六段），个别年代下限可能晚至西周初期^⑥。而丰镐遗址目前所出 2 片陶文“周”，分别为先周晚期和西周晚期偏早阶段，时间跨度广于周原遗址。那为何西周早期之后，周原遗址尚不见有陶文“周”？这反而是目前学界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四、王都称“周”与不同时期的例证

丰镐遗址在先周晚期与西周晚期偏早阶段均出现有陶文“周”，是目前所见时代下限最晚的。因此，丰镐遗址存在西周晚期依然被称为“周”的可能性。

故我们推测，先周晚期至整个西周时期，王所居的具有王都性质的城址均可称“周”。从出土实物出发，赞同朱凤瀚“文献与金文中能称‘周’之城邑，应是王所居之都城，西周都城所在如宗周、成周应均可称之为‘周’”^⑦的观点。反之，这也能够解释为何表一中所列唐兰、李学勤等在讨论“周”指何地时，发生了在不同文章中表述有“周”指成周、岐周、王城、宗周这样观点前后改变的情况。因为西周时期本就不止一地可拥有“周”的称呼。

这一情况可找到相关例证。赵庆森提出的“异地同名”^⑧之说，可部分解释这一问题，如商时期，有多地同时可称“亳”，其作为都城或先王宗邑同时存在，后世人们为了从地理上区分，在“亳”字前加之方位，才有了郑亳、西亳、南亳、北亳之说^⑨。

西周时期，存在多个“虢”。《春秋左传正义》载：“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⑩《国语集解》云：“孝友二虢。”^⑪可知，西周初年分封时，分封有两个“虢”，两者在周初均称“虢”，都城亦称“虢”，后世为了区分才称以东虢、西虢^⑫。

两周时期，楚国多个国都被称“郢”的情况，更是众所周知的。

因此，无论是丰镐遗址出土的陶文“周”，还是周原遗址出土的陶文“周”，基本都指向了先周晚期至整个西周时期，王所居的具有王都性质的城址均可称“周”这一可能。这或与先秦时期的“多都并存”制度^⑬有关。

五、结 语

通过辨析丰镐遗址新出陶文,我们倾向该字读作“周”。由此可讨论先周晚期与西周时期何地可称“周”的问题,并观察背后历史现象,对前人的说法进行一些补充。

从丰镐遗址先周晚期沔西马王村 H11 的“周”字陶鬲、西周晚期偏早沔西 17T1932H7: 25 “周”字陶片与周原遗址凤雏基址、齐家村和礼村的“周”字陶片看,先周晚期至整个西周时期,周王所居具有王都性质的城址即丰镐、周原均可称“周”。这一现象亦可从商时期有多地同时可称“亳”,西周时期存在多个“虢”,两周时期楚国多个国都被称“郢”的情况中得到佐证。而为何西周早期之后周原遗址目前不见有陶文“周”?是下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陕西丰京大原村西周制陶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3AKG00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阐释工程(2025)阶段性成果。

注 释:

- ①⑭⑱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西安市沔西大原村制陶遗址 2017~2018 年发掘简报》,《考古》2022 年第 9 期。
- ②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20 页。
- ③⑮⑯陈全方:《周原出土陶文研究》,《文物》1985 年第 3 期。
- ④⑧⑩③④⑤⑤雷兴山:《由周原遗址陶文“周”论“周”地与先周文化》,《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学术卷》,文物出版社 2009 年,下同,第 267 页;第 267 页;第 263—275 页;第 263—275 页;第 271 页;第 267—268 页;第 267 页。
- ⑤⑦董珊:《试论殷墟卜辞之“周”为金文中的姁姓之珣》,《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 年第 7 期。
- ⑥ 郭沫若说转引自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第 97 页。
- ⑦ 王恩田:《释𠂔、𠂔、𠂔——兼说𠂔、𠂔字形》,《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中华书局 2004 年,第 29—35 页。
- ⑨⑩郑州大学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伊川徐阳墓地东区 2015~2016 年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20 年第 3 期。
- ⑪ 孟德会、刘余力:《谈洛阳伊川徐阳墓地出土的两件铭文铜器》,《文博》2022 年第 2 期。
- 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二册),中华书局 2007 年,第 1483 页,文中简称《集成》。
- ⑬ 刘庆柱、段志洪、冯时主编:《金文文献集成》(第十六册),线装书局 2005 年,第 603 页。
- ⑬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8 页。
- ⑬ 陈全方:《早周都城岐邑初探》,《文物》1979 年第 10 期。
- ⑬ 宗德生:《试论西周金文中的“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 2 期。
- ⑬ 尹盛平:《试论金文中的“周”》,《周文化考古研究论集》,文物出版社 2012 年,下同,第 291—301 页;尹盛平:《关于“周”的问题》,《周文化考古研究论集》,第 372—383 页。
- ⑬ 冯时:《陕西岐山周公庙出土甲骨文的初步研究》,《古代文明》(第 5 卷),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第 208 页。
- ⑬ 孙庆伟:《凤雏三号建筑基址与周代的亳社》,《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 年第 3 期。
- ⑬ 刘海宇:《西周金文“王在周”所涉及建筑考述——兼说凤雏三号基址大型石柱为宗庙碑》,《东方考古》(第 17 集),科学出版社 2020 年,第 111—124 页。
- ⑬ 何树环:《论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周”——文献、铜器、考古的综合考察》,《青铜器与西周史论集》,天津出版社 2013 年,第 369 页。
- ⑬ 何景成:《西周王朝政府的行政组织与运行机制》,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年,第 63 页;第 68 页。
- ⑬ 曹玮:《也论文中的“周”》,《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581—603 页。
- ⑬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 2004 年,第 366—374 页。
- ⑬⑬朱凤瀚:《〈召诰〉、〈洛诰〉、何尊与成周》,《历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
- ⑬ 赵庆森:《再论西周时期的“周”地及相关问题》,《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第 497—517 页。
- ⑬ 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 年第 1 期。
- ⑬ 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陕西扶风新出墙盘铭文解释》,《文物》1978 年第 3 期。
- ⑬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年,第 140 页。
- ⑬ 李学勤:《论史墙盘及其意义》,《考古学报》1978 年第 2 期。
- ⑬ 李学勤:《柞伯簋铭考释》,《文物》1998 年第 11 期。
- ⑬ 徐良高:《丰镐手工业作坊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南方文物》2021 年第 2 期。

(下转第 90 页)

- 第11期。
- ①⑦ 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赤峰县文化馆：《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咀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5期。
- ①⑧ 赤峰考古队编著：《大山前第Ⅰ、Ⅱ地点发掘报告》，故宫出版社2002年。
- ①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 ②② 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辽宁北票县丰下遗址1972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3期。
- ②③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北票市康家屯城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8期。
- ②④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凌源市博物馆：《辽宁凌源市邵杖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 ②⑤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 ②⑥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唐山市古冶商代遗址》，《考古》1984年第9期。
- ②⑦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卢龙县东阕各庄遗址》，《考古》1985年第11期。
- ②⑧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4年第8期。
- ②⑨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
- ②⑩⑪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昌平区文化委员会：《昌平张营：燕山南麓地区早期青铜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 ②⑫ Gordon Childe.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y*,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56, pp. 26—28.
- ③⑬ 包曙光、余肖肖：《夏家店下层文化动物遗存研究》，《农业考古》2020年第4期。
- ③⑭ 孙永刚：《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植物遗存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 ③⑮ 朴真浩：《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经济与社会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
- ③⑯ 孙周勇：《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口簧研究》，《文物》2020年第1期。
- ③⑰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阜新市文物管理办公室：《辽宁阜新县代海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11期。
- ③⑱ 高美璇：《兴城县仙灵寺商周时期古遗址发掘收获》，《锦州文物通讯》1985年第2期。
- ③⑲ 李延祥、贾海新、朱延平：《大甸子墓地出土铜器初步研究》，《文物》2003年第7期。
- ④⑰ 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第3期。
- ④⑱ 陈翔：《殷墟骨版形制与功能研究》，《文物》2019年第9期。
- ④⑲ 李伯谦：《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1952—1982）》，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50—170页。

〔责任编辑 阴美琳〕

（上接第71页）

- ④⑲ 雷兴山：《由周原遗址陶文“周”论“周”地与先周文化》，《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学术卷》，第268、270—271页；李宏飞：《商末周初文化变迁的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208页。
- ④⑳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队：《陕西长安鄠县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6期。
- ④㉑ 特别说明，此表主要是引用了雷兴山：《由周原遗址陶文“周”论“周”地与先周文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7年总第33期；雷兴山：《由周原遗址陶文“周”论“周”地与先周文化》，《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学术卷》；董珊：《试论殷墟卜辞之“周”为金文中的妘姓之珣》，《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7期，这3篇文章中的表格与图片，并稍加补充。
- ④㉒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南邠州·碾子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第201页。
- ④㉓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武功岸底先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3期。
- ④㉔ 刘士莪编著：《老牛坡——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田野发掘报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68页。
- ⑤⑰ 有关后世陶文戳记的讨论可参看刘庆柱、李毓芳：《秦都咸阳遗址陶文丛考》，《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二号·古文字论集》，1983年，第59、75—84页；后晓荣：《秦市亭陶文性质的新认识》，《考古学报》2019年第3期。
- ⑤⑱ 赵庆森：《先秦“异地同名”现象与地名流动的初步考察》，《史学月刊》2020年第10期。
- ⑤㉑ 部分参考程平山：《释“三毫”》，《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05—517页。
- ⑤㉒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3896—3897页。
- ⑤㉓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361页。
- ⑤㉔ 有关“虢”的讨论颇多，参见王建军：《殷周时期“虢族”“虢国”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原文物》2020年第4期；马军霞：《虢国综合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 ⑤㉕ 先秦“多都并存”制度潘明娟有过十分详细的研究，潘明娟：《先秦多都并存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责任编辑 阴美琳〕